



观澜集

胡 军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THE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000 MUSEUM AVENUE
NEW YORK, N.Y. 10028

PRINTED IN THE U.S.A.

B2-53

H475



观澜集

胡军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8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澜集/胡军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

(北大哲学系系庆丛书)

ISBN 7-301-07147-7

I . 观… II . 胡… III . 哲学思想-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435 号

书 名: 观澜集

著作责任者: 胡 军 编

责任编辑: 古 松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147-7/B·027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9 印张 35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代哲学

——代前言

胡 军

中国哲学界的共同看法是把新文化运动的开端（1915年9月）视为中国现代哲学的起点。于是，“中国现代哲学”事实上指的是从1915年至今的这一时期内的哲学。

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端实际上与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创立几乎是同时的。哲学门招生开始于民国三年，即1914年，创设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科系。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正是由于有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创设在先，才有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端于后。这可以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教科书的内容体系窥见个大概。就目前看，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教科书不下十来种，这些教科书的共同的做法是把陈独秀和胡适看做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实质上，严格地按照学术思想的分野，陈独秀的思想并不能够划在哲学思想范围之内，而且根据陈本人的思想性质看，他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位思想启蒙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家。但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所以中国现代哲学史不得不把他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也勉强说得过去。但真正具有这样资格的人物应该是胡适，而不是陈独秀。胡适留美归国后即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教，讲授西洋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在国内系统地讲授实验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是他首先引进了西方哲学的范式，以此研究中国哲学，奠定了中国哲学研究和讲授的基本的范式。

1

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无“哲学”这一概念，更无这一学科。“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用以翻译西洋的“philosophy”概念的。黄遵宪于1887年首先引进了这一概念。他在其《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一中曰：“有东京大学，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此后，“哲学”一词在国内逐渐为学人所引用。如康有为曾在给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建议在学校中开设“哲学”的学科。

但在胡适之前尚无人能够正确地理解“哲学”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更没有人能够将“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不错,在胡适之前的谢无量曾出版过《中国哲学史》(1916年10月出版,中华书局,上海),此书虽冠以“哲学史”的名称,但其内容和研究方法仍然是沿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学案模式。所以他的书是有“哲学”之名,而无“哲学”之实。胡适却与之不同,他在美国系统地学习过西方哲学,至少知道“哲学”究竟为何物,也洞悉西方哲学的诠释模式。这就帮助了他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

建立哲学的诠释模式,当然,首先必须真正懂得哲学的内涵。胡适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出版,商务印书馆,上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说:“凡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他进一步,根据这一定义,把哲学划分为宇宙论、知识论、方法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宗教哲学等。所谓的哲学史研究也便是在以对哲学的这一理解的观照下进行的。于是胡适说:“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之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至互相辩论。……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1]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对哲学和哲学史是有着清清楚楚的理解。他对哲学的看法或定义未见得人人同意,他的哲学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说胡适不懂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胡适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把哲学的名和实真正地结合起来的第一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不胫而走,不到两个月就印行两次,两年内共印行七次。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中国成立的标志。它在中国学界的广为传播也印证了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模式得到了学者的广泛的承认和普遍的运用。

“中国现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部分或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延续。我们现在对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的模式基本不出胡适当时的哲学研究模式。而且胡适本人又成为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篇人物胡适是当之无愧的。因此,北京大学哲学门的设立在客观上揭开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序幕。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中西哲学交流融会的背景下发展演变起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作用表现在以下的几个

方面。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库。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个领袖人物是陈独秀与胡适。但此两人在运动所担当的角色是不同的。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有革命家的豪气和霸气。他主张民主与科学，但对之缺乏一以贯之的和深入系统的了解。胡适与之不同，他始终不是一位革命家，而其终身意愿是成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且在美国学习多年，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比较深入切身的体会和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对于什么是民主和科学，他有自己一套比较系统的看法。对新文化运动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着很好的见解，每每发前人之所未发。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启发了陈独秀的灵感，使后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下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是此两人的密切结合才使白话运动势如破竹地在全国普及开来。陈独秀和胡适的结合实质上是革命家和学者的结合，是革命实行家和思想家的结合。陈独秀早期也提倡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胡适才提出了系统的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引进和学习研究的基地。

陈独秀和李大钊率先在哲学系开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1920年哲学系的学生邓中夏、刘仁静和罗章龙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进而成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1921年哲学系的学生张国焘和罗章龙代表北京共产党支部参加了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个世纪50年代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系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内容。由黄楠森教授任主编的七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国内迄今最为完善系统的、最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科书，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为了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2000年哲学系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

第三，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中心。

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与其他学会共同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大事件。杜威来华讲学两年零两个月，足迹遍及十来个省，但其讲学活动的中心是在北京大学。他的哲学思想在其来华之前已经有人作了介绍，然对其作系统深入介绍的第一人应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适教授。杜威在华的五大演讲基本都是由胡适任翻译。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受其影响。罗素来华的讲学活动主要也是在北京大学，为了传播和研究罗素的哲学思想，北京大学成立了“罗素学说研

究会”，不定期举行讨论会，交流学习和研究的心得。北京大学并专门发行了《罗素研究季刊》。罗素来华讲学在中国哲学界播下了逻辑分析方法和分析哲学的种子。此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就是通过北京大学的讲坛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和罗素哲学思想在哲学系风光不再。张颐回国，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开设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可以说，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也首先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得到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才逐渐地影响到其他地方。接踵而至的贺麟、陈康、郑昕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一步推进了对于古希腊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研究。

第四，新儒家的发源地。

新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陆的学界曾出现过新儒学研究的热潮。新儒家也是上世纪 50 年代后港台思想界的显学。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自觉地将熊十力看做是其哲学思想的源头活水。熊十力作为新儒家的第一代，其代表作品《新唯识论》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完成的。其实真正称得上是新儒学开创者的应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梁漱溟。早在熊十力之前，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汹涌而入，他就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未来世界的新文化必须以儒家文化为本位。他深切地感觉到儒家思想在未来必定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所以梁漱溟和熊十力是新儒家的第一代，对后期新儒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后的贺麟也可以说是一位主张复兴儒学的学者。他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儒家思想新开展”的课题。1952 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冯也被学界的很多人看做是大陆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港台新儒家中最有学术权威的牟宗三曾经是熊十力的学生，也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过。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儒家思潮首先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内形成了一个传统，由梁漱溟而熊十力而冯友兰而贺麟薪火相传，至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勱始形成了所谓的“新儒家”阵营，发展成为了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的思潮。

第五，佛学思想研究的基地。

当初蔡元培邀请梁漱溟至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意是让梁开设印度哲学方面的课程。但他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印度佛学。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认为是新儒家思想的作品，其实梁漱溟本人就直截了当地说：他讨论文化问题的思想前提是所谓的佛家唯识学，“我这个人未尝学问，种种

都是妄谈，都不免‘强不知以为知’，心里所有只是一点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于佛家思想。”他指出，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都是印度的佛家文化。梁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还撰写了《唯识述义》一书。梁于1924年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建议由熊十力接替他开设佛学思想的课程。熊十力经历了由儒转佛的过程，从大乘有宗入手，后舍有宗而转入大乘空宗。在北大讲授法相宗的过程中，他企图将唯识学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熔为一炉，他的《唯识学概论》讲义1923年由北京大学印刷发行。几乎同时，他开始构思撰写《新唯识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佛家思想研究在汤用彤先生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汤氏穷毕生之力研究汉唐佛教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的赞扬。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迄今被认为是在这一研究难以超越的成果。此外，周叔迦、马叙伦等人也十分重视对佛学唯识学的研究和著述。重视佛教史的研究始终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大特点。

第六，哲学人才的摇篮。

自哲学门创立至今共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学生，已经和正在成为工作在海内外哲学研究及其他领域内的骨干人物。其中著名的有冯友兰、陈公博、许德珩、顾颉刚、潘梓年、邓中夏、容肇祖、朱自清、朱谦之、牟宗三、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张岂之、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朱德生等。

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的特色，即重视中西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研究。在1950年后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历史，但其侧重点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哲学门创立之初设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实际存在的只有中国哲学门。但这一课程设置却突出了中外哲学并重的特色。胡适来哲学系后，既开设了西洋哲学和实验主义哲学的课程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的课程。

这一课程设置反映了北大哲学系学人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看法。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对中国传统哲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压力。毋庸置疑，西方哲学自有其精华，而中国传统哲学也自有其糟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如何取西方哲学之长来补中国传统哲学不足，也就是中国学人一直在考虑的重要问题。

汤用彤对于中西文化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自觉的看法。他指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渗透、移植乃至交融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对外

来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而是要有分析,要有鉴别,要有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吸取他人之长处,加以消化和吸收。正是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在其掌管北京大学哲学系之时,汤用彤坚决主张,研究哲学史,应该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兼治,强调对哲学史原典的解读。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一人之力先后开设了关于西方哲学史、印度哲学史、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哲学概论等课程。

正是在胡适、汤用彤等人的长期影响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形成了重哲学史研究、重考据的风气,强调精致严密的综合性的学术训练。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方法论指针。假设一定要大胆,求证却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细心,必须要拿出充分的证据。而且对于证据也必须追问:这些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得到的?什么时候寻出的?什么人寻出的?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他虽然有做证人的资格,但在这一证据上他有作伪的可能吗?学问一定要坐实,不崇尚玄虚。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一学风大大地不同于1952年之前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后者受金岳霖的影响较大。金岳霖首先在国内比较系统地引进了现代数理逻辑,注重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务求至精至细,牛毛茧丝毫不遗漏。分析成为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主要的方法。金岳霖讲究分析方法,冯友兰、张岱年也竭力提倡逻辑分析方法。金岳霖等人也曾邀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过现代逻辑,但此种逻辑分析方法却未能触发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的强烈兴趣。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注重哲学思想体系的创立,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金岳霖完成了《论道》、《知识论》的理论创造,冯友兰几乎也在同时发表了他“贞元六书”。据说金岳霖曾戏称,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学而不思”,清华大学哲学系是“思而不学”。这一说法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两系的某些方面的特点,但却有其片面性。因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虽然注重哲学史的研究,讲究考证,然也有将哲学史的研究和哲学理论创造结合起来的学者,熊十力就是这样的杰出的代表,《新唯识论》就是这样的代表作。清华大学哲学系也并不是只“思而不学”的,如冯友兰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但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史家。显然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同于胡适和汤用彤的。后者的方法主要是“汉学”的方法,而前者却主要是“宋学”的方法。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进行调整。在此调整的结果是六个大学的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了全国惟

一的哲学系。因此这一调整无论对于中国现代哲学，还是对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说都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中国哲学界的精英云集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才荟萃，盛极一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汤用彤、郑昕、贺麟、胡世华、容肇祖、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齐良骥、晏成书、杨祖陶、王太庆等。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王宪钧、邓以蛰、沈有鼎、任华、周礼全、朱伯崑等。辅仁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李世繁、汪奠基等。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洪谦、张东荪、吴允曾等。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宗白华、张颐、熊伟、何肇清、苗力田等。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朱谦之、李日华、马采、方书春等。客观上，各大哲学系的教师汇集北京大学，有利于各哲学系的学风、治学方法和哲学各二级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补。尤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的汇集一堂，优势互补，充实加强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繁荣和发展。

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金岳霖。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成立，金岳霖奉调任该所副所长。也就在此前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恢复成立哲学系，部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员也就分赴各地的哲学系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的分而合，合而分，一方面使北京大学哲学系得到了其他院校哲学系的师资的和思想的资源滋养，另一方面也使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风、治学方法影响了其他院校的哲学系。

由上可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而显著的地位。《中国现代哲学》这一学科已逐渐走向成熟，其内容也已基本定性。胡适、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张岱年、冯契、李达等人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必须要研究的重点人物。上述的前七位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冯契也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由此可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现代哲学上的地位。

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科齐全，涵盖了全部八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教学课程体系完备，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2002年在教育部“二期211工程”子项目“哲学重点学科的建设”的评审中，北京大学哲学系独占鳌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美学被确立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3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心对全国哲学学科进行学科评估，北京大学哲学系位居第一。

北大哲学系的今天骄人业绩是其辉煌历史累积的结果。《庄子·养生主》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柴有燃尽之时，然火却未曾熄灭，永远燃烧。人的躯体是有限的，但哲学思想和生命精神却可能是无限地在时间和空间中流传和扩展的。哲人已逝，然其深邃的哲学思想所凝聚的哲学传统，他们对北京大学哲学系所作的巨大贡献会永远留存于哲学系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应该努力奋斗，继承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优秀传统，创造哲学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应该高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为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中国文化的振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我们即将欢庆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9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既应该客观地总结90年以来哲学系教学、科研及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更应该展望哲学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集的编辑就是为了反映哲学系近9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的一角。

注 释

- 〔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页，商务印书馆，上海，1919年。

目 录

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代哲学——代前言 胡军/1

论蔡元培的学术观念和美学思想 章启群/1

章士钊和他的《逻辑指要》 宋文坚/11

马叙伦《老子校诂》述评 王 博/19

陈大齐的逻辑体系 何 浅/29

试论熊十力哲学的性质 郭齐勇、李明华/39

胡适的实在观与方法论 宋志明/49

邓以蛰的生平与学术贡献 刘纲纪/54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 郑大华/65

汤用彤学术方法论述略 孙尚扬/78

张申府的哲学思想 张岱年/85

金岳霖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 胡 军/90

冯友兰与当代新儒学 李中华/116

宗白华美学与生命哲学 彭 锋/129

从朱光潜“接着讲” 叶 朗/146

何兆清的评价逻辑研究 宋文坚/160

容肇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袁尔钜/165

略论朱谦之的文化观 洪九来/170

逻辑多学科开拓者汪奠基先生 宋文坚/179

陈康、苗力田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兼论西方

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翻译方法 汪子嵩/184

冯定同志《平凡的真理》的理论价值重估 谢 龙/196

贺麟的治学之道 张祥龙/209

论牟宗三的“呈现” 张学智/215

略谈沈有鼎先生对逻辑在中国的发展所作的两点贡献 诸葛殷同/227

洪谦与维也纳学派 古 月/233

王宪钧论普通逻辑 邢滔滔/247

熊伟和中国现代哲学 郁振华/260

胡世华先生的学术成就 杨东屏/269

李世繁先生对逻辑学与哲学的执著与贡献 赵总宽/274

石峻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 杨庆中/285

后记/291

出版后记/292

论蔡元培的学术观念和美学思想

章启群

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后来又几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为促进中国现代的教育、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一直被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尊为楷模和泰斗。蔡元培从留学德国时起,即发表关于哲学和美学的文章和讲演。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20世纪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毅然弃官离职,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留学期间,他对西方尤其是康德以来的哲学和美学作了深入研究。出身于科举、受过传统私塾严格训练的蔡元培,由此迅速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科学和教育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西方的哲学、科学等,应该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参照系,甚至是一种尺度和规范。蔡元培在1910年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虽然只是对于中国从上古时期开始一直到清代的伦理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但从语言到方法、甚至观念,还是看出一种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新的品格和气象,流露出西方学术影响的痕迹。不久,蔡元培又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写了《哲学大纲》,并于1915年出版。《哲学大纲》对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历史发展以及相关学科,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从这里可以看出,蔡元培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知识是非常扎实的,基本达到了对于西方哲学的实质问题和根本精神的一种内在把握与体悟。正是具有这种坚实的西方学术的背景,具有这种从内在精神处对于中西学术的领悟和比较,他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自然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经学的现代意识。

用这种新的观念审视中国传统学术或当代学术,蔡元培首先认为,中国古代也有哲学,不过,“哲学在我国古书本名为道学”。^{〔1〕}而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可以分三期,“一是周季,道家、儒家、墨家等,都用自由的思想,建设有系统的哲学,等于西洋哲学史中希腊时代。”“二是汉季至唐,用固有的老庄

思想,迎合印度宗教。译了许多经论,发生各种宗派。其中如华严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等,都可算宗教哲学。”“三是宋至明,采用禅宗的理想,来发展儒家的古义。其中如陆王派,虽敢公然谈禅,胜似程朱派的拘泥,但终不敢不借儒家作门面。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等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烦琐哲学。”此后“稍稍着手于哲学的,惟有戴震”。^[2]但是,他认为在当代,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哲学。

蔡元培在1923年12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严格说来,这50年只有“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3]尤其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研究西方哲学的不用说,即使是“近年整理国故的人,不是受西洋哲学影响,就是受印度哲学影响的。”^[4]当然这也是必要的。因此,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说:“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字又是很多。若没有作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5]

这些论述表明,蔡元培当时的观念是用西方学术的基本体系、范畴和结构,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合和转换,试图建立新的现代中国的学术体系。

蔡元培对于美学这门学科,可谓情有独钟。在留学德国期间,他主攻美学。归国后,1921年秋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美学课程。1935年,已经将近70岁的他说:“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心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6]这表明他对于美学的浓厚兴趣和热爱始终没有消失。

在美学理论方面,蔡元培基本接受了康德的观念和思想。^[7]他在《哲学大纲》中的“美学观念”一节说:“美学观念者,基本于快与不快之感。与科学之属于知见,道德之发于意志者,相为对待。科学在乎探究,故论理学之判

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乎欣赏,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是吾人意识之发展之各方面也。”^[8]这里基本是依据康德“三大批判”的内容所对人的心意能力及其对象所作的划分。但是,他又说:“意志论之所诏示,吾人生活,实以道德为中坚,而道德之究竟,乃为宗教思想。其进化之迹,实皆参互于科学之概念。哲学之理想,概念也,理想也,皆毗于抽象者也。而美学观念,以具体者济之,使吾人意识中,有所谓宁静之人生观。而不至疲于奔命,是谓美学观念惟一之价值。而所由与道德宗教,同为价值论中重要之问题也。”^[9]这其中又有他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美感和美的本质时,蔡元培直接介绍了康德的观点:“康德立美感之界说,一曰超脱,谓全无利益之关系也。二曰普遍,谓人心所同然也。三曰有则,谓无偶的之可指,而自由其赴的之作用也。四曰必然,谓人性所固有,而无待乎外铄也。夫人类共同之偶的,为今日所堪公认者,不外乎人道主义,既如前节所述。而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性,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性之良药也。而美感者,不独对于妙丽之美而已。又有所谓刚大之美,感于至大,则计量之技无所施;感于至刚,则抵抗之力失其效。故鉴赏之始,几若与美感相冲突。而心领神会,渐觉其不能计量,不能抵抗之小己,益小益弱,浸遁于意识之外。而所谓我相者,乃即此至大至刚之本体,于是乎有无量之快感焉。”^[10]

这里基本上转述了《判断力批判》上卷关于美和崇高的论述和思想,只是蔡元培没有使用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概念“崇高”,而是用“刚大”来表述。后来,他说的更简单明了:“美的普遍性,就是没有概念。他是纯粹对于单一对象的判断。我们说美,是一种价值的形容词,不是一种理论的知识,为一种实物,或一种状态,或一种关系,来规定性质的。”^[11]很有意思的是,蔡元培也举花的例子来说明审美与科学的不同:“科学是用概念的,美术是用直观的。譬如这里有花,在科学上讲起来,这是菊科的植物,这是植物,这是生物,都从概念上进行。若从美术家眼光看起来,这一朵菊花的形式与颜色觉得美观就是了,是不是叫作菊花,都可不管。其余的菊科植物什么样?植物什么样?生物什么样?更可不必管了。”^[12]这与后来朱光潜所说的“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不同态度”,具有十分切近之处。不过,蔡元培还强调,“科学虽然与美术不同,在各种科学上,都有可以应用美术眼光的地方。”^[13]比如在美术上运用十分广泛的“黄金分割法”,在现实实用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920年秋,蔡元培在湖南第一师范作了7次讲演,基本上都与美学、美